

积极老龄化离我们有多远

——基于老年人精神需求的思考与探索

方建移

(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养老的核心问题已从解决贫困和物质匮乏转变为如何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积极老龄化的精髓和核心即是社会参与,主动积极的社会参与有助于老年人获得尊敬和尊严,感受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然而,负面的老化刻板印象、消极特征取向的涉老研究,阻碍了积极老龄化的推进,不利于老年人精神需求的满足。基于对老龄化困境、老化刻板印象、精神需求内涵等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在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的社会背景下,建构城市养老与乡村振兴的“双赢”机制,利用美丽乡村的环境优势和闲置住房,助力城市养老,同时发挥城市老人的智力优势和知识技能,添翼乡村振兴,不但有助于解决乡村振兴的人才瓶颈,更重要的是满足老年人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关键词:积极老龄化;精神需求;社会参与;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22)01-0126-11

DOI:10.14134/j.cnki.cn33-1337/c.2022.01.013

我国自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以来,老年人口占比不断增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19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达到2.64亿,占总人口的18.7%,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91亿,占总人口的13.5%。

一、解码老龄化困境:积极老龄化

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以及人口出生率的降低,老龄化已成为世界性难题,也是未来很长一个时期的常态。这道难题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人类追求品质生活的必然结果。

(一)“老年负担论”的时代局限

在生产力低下的农业社会,由于生产技术的限制,增加劳动力供给成为提高产出的主要方式。对

收稿日期:2021-02-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市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四维一体’整合模式研究”(20BSH016)

作者简介:方建移,男,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心理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心理、公共决策与舆情分析研究。

家庭而言,由于经济不发达、收入水平低,人们常常难以在劳动年龄期间准备足够储蓄来维系老年时期的生活开支,因此必须生育更多的后代,通过“养儿防老”来解决老年赡养问题。

人口学家以“社会抚养比”这一概念来解释由于出生率下降导致的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占比的提高所带来的社会负担。社会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力人口数与劳动力人口数量之间的比率,用以度量劳动力人均所负担的赡养非劳动力人口的数量。非劳动力人口包括未成年人口和老龄人口,统计部门用老龄人口抚养比直接度量劳动力的养老负担。由此,老年人比重的增加就被许多研究者视为社会负担和社会问题,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负债加重的观点也就广为接受。“人口红利”说认为,人口年龄结构跟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经济体中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将导致产出增加,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此外,经济体中劳动力人口所占比例的不断增长,意味着有更多的人从事劳动生产与价值创造,同时需要劳动力赡养的人口比例减少,这同样有利于经济发展^[1]。与之相反,一个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小、人口抚养负担重的人口结构,则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这就是“人口负债”。

“人口红利说”将老年人视为经济增长的严重阻碍,认为老龄化社会必定会丧失科技创新力和经济竞争力,“人口负债说”则将老年人视为可怕的社会福利负担,这两种观点都机械地将“老年人”与“负担”等同,并不符合当今社会的实际。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到工业时代,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使得生产关系出现了根本性变革,机器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降低了对人体能的要求。此外,由于人均收入的提高、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人们逐渐有条件通过储蓄等途径来确保年老时的生活支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至少在物质层面,老年人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养儿防老的物质前提已不复存在。

老年人并非都是等待照顾和护理的弱势群体。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老年的界定,60-74岁为年轻老年人,75-89岁为老年人,90岁及以上为长寿老人。我国年轻老年人群体具有规模大且持续增加、健康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等特点。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低龄老年人约占老年人口的56.2%,规模超过1亿,预计在2030年前后将达到2亿人的规模。低龄老人的预期余寿为22.8年并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其中健康预期余寿为17年左右^[2]。这说明低龄老年人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具备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条件,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低龄老人依然在以不同的方式服务家庭和社会。另据2015年全国老龄办、民政部等联合举行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中,15%为80岁以上高龄老人,15%为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由此可以推断,低龄健康老人占大多数(70%),更何况高龄老人中还有相当比例的人自理能力很强。^①

传统老年和老龄定义均以简单的时钟年龄为基线,并多与法定退休年龄相挂钩,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退休”与“衰老”“负担”相等同的社会认知。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2019年底这一数字已变成77.3岁。随着健康水平的提升以及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的改变,老年人群体的属性及特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社会对老年人的主流观念却未随之及时更新。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它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必然结果,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然而遗憾的是,当前老龄研究与实践中仍充斥不少负面乃至悲观的情绪,将老龄化当成不正常的人口和社会态势,认为人口老龄化势必延缓经济发展。其实,已有相当多的证据揭示老龄化对宏观经济发展并未带来不可逾越的挑战。闫海春(2019)从广义经济增长质量的角度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3]。事实上,无论是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从我国最近几十年来的高速增长看,老龄化不但与经济发展进程同步,甚至与经济增长显现出一定程度的正相关。

^①该调查由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领导,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办,国家统计局批准,每五年开展一次,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国情调查。该调查始于2000年,第5次调查结果尚未公开发布。

(二) 积极老龄化的核心:社会参与

由上述分析可知,老年人并非都是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如今,70岁以下的老人均出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出生年月的后移,人们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机会逐渐增多,受教育年限也逐步增加。这些“新老年人”在教育背景、经济收入、价值观念、权益意识等方面都与上一代老年人明显不同,他们容易接受新事物,愿意参与社会建设,这为践行积极老龄化奠定了基础。

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提出积极老龄化理念,2002年,联合国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将该理念写入政治宣言。同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积极老龄化:一个政策框架》,指出“积极”不仅仅指体力活动和劳动,还包括对社会、经济、文化等的持续参与并发挥作用。

积极老龄化理念的提出与20世纪末西方心理学界兴起的积极心理学思潮密不可分。积极心理学一改以往的问题研究取向,主张研究人类的积极品质,充分挖掘人固有的、潜在的、具有建设性的力量,以促进个体和社会的发展。与之相通,积极老龄化视老年人为家庭和社会的重要资源,将老年人从社会问题的集中者、社会资源的消耗者、社会发展的压力转变为解决者、创造者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4],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促进社会发展,并将其作为预防或延缓老年人出现不良的生理、心理或社会变化的手段,进而消除老年歧视主义和老年群体的边缘化、病态化。

社会参与是积极老龄化的核心。社会建构论者格根夫妇认为,“生理、心理及社会方式上的自我提升”“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展”以及“广泛的社区参与”是积极老龄化的有效方式^[5]。积极主动的社会参与不但能够延缓老年人认知能力的退化,而且有助于增强积极情绪体验。盖西奥克、福勒和吉尔斯采用潜在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发现,“参与(engaged)”的个体比“脱离(disengaged)”的个体在面对老化时报告的积极情绪更多、消极情绪更少,在老化体验上也更好^[6]。

有研究表明,在控制社会人口学变量、认知损伤、健康水平等基线之后,社会网络越广、社会卷入程度越高的老年人认知能力越不容易衰退,而回避社会活动的老年人容易产生认知老化^[7-8]。

张文宏、张君安(2020)基于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发布的数据,从结构性社会资本、认知性社会资本两个维度分析中国老年人口的心理健康状况。研究发现,在控制相关变量后,个体社会资本的会增加会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9]。社区网络、公民参与、公民身份(归属、团结、平等)、互惠和合作规范以及对社区的信任等,则是最常被界定的社会资本^[10]。

积极老龄化的理论基础就是活动理论,老年人参与社会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老年人获得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11-12],能够帮助老年人重新树立自我认同感,实现人生价值,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有着显著的影响^[13]。此外,通过分享共同的兴趣和社会活动,还可以增加老年人的归属感^[14-15]。

积极老龄化可理解为“保持积极”或避免被动,积极主要在于按照自己而不是他人的规范来生活。也就是说,积极老龄化是老年人按照自己的需求、愿望和能力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精神和公民事务的过程。不仅仅是辅助劳动、公益活动,而是老年人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在提升自我价值的同时创造社会价值,不断体验服务社会的成就感。

二、解锁积极老龄化障碍:老化刻板印象与老年负面认知

长期形成的消极老化刻板印象是推进积极老龄化的基础性障碍。积极老龄化倡导全社会以积极的心态看待老龄化,让老年人融入社会而不是被保护或被歧视,强调发挥老年人的潜能并使之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而非负担。然而,我国传统的养老理念过于强调将老年人作为弱势群体来予以保障和保护,现有文化语境和养老制度也在心理暗示和角色设定上反复强调老年人的“衰老与无用”^[16]。这种“去社会化”的“柔性歧视政策”过于偏重满足老年人的物质需求和亲情陪伴,忽视了老年人的社会参

与和自我实现,与“积极老龄化”的理念相背离。

(一) 传播媒介中的老化刻板印象

所谓刻板印象,是指社会上对于某一类事物具有的一种比较固定、概括而笼统的看法。老化刻板印象(aging stereotype)就是人们对老年人这一特定社会群体所持有的观念与预期^[17]。当然,这里的“人们”,既包括非老年人,也包括老年人自己。刻板印象是认知者对某类群体进行快速信息加工的便利方式,老化刻板印象影响着社会对老年人的认知。

在很多人看来,老年人是“需要照顾的”“体弱多病的”“思想保守的”,这些观念可能来自媒体的表征(representation),也可能来自日常生活经验。由于社会环境和媒体报道的潜移默化,人们早在童年时期就开始从日常生活中内化积极或消极的老化刻板印象,在童话故事、电视和日常交谈中,不知不觉地形成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在儿童读物中,可以经常看到大量描述老年人的消极语句,如“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拄着拐杖”“蹒跚地穿过马路”。国外有研究发现,当儿童被问及变成老年人有什么感觉时,60%的孩子回答的感受是消极的;4-7岁儿童中,有66%说自己不愿意变老^[18]。班尼特和盖恩斯的研究表明,儿童对老年人的消极刻板印象多于积极刻板印象^[19]。潘瑟斯对新闻媒体中老年人的形象表征进行研究后发现,老年人被典型地描述为“丑陋的、无牙的、无性征的、失禁的、衰老的、糊涂的、无助的……”^[20]。美国老年学家帕尔默曾把老年歧视主义的10种定型归纳为:疾病、性无能、丑陋、心理衰减、心理疾病、无价值感、孤独、贫穷、沮丧、老龄政治^[21]。

陈曦从年龄、性别、道德品质层面对2012—2017年具有代表性的涉老偏见报道进行特性分析后得出:大众媒体重构后的老年群体形象被贴上了边缘、弱势的负面标签^[22]。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文第一段文字就给老年群体加上了“处于弱势地位”这一修饰语。可见,对很多人来说,这类刻板印象是根深蒂固的、不需要意识驱动的。

景军、李敏敏以四川美术学院举办过的三次以关爱老年人为主题的高校学生公益海报设计创意大赛中的609幅获奖和提名获奖作品为研究对象,考察老年人形象的视觉化呈现。研究发现,以负面消极的老年人形象和悲惨生活境遇作为艺术表现方式的海报占65%,这些作品充斥着颜色压抑、身影孤独、面孔哭丧、步履蹒跚、手掌粗糙,或以轮椅、药瓶、输液管为伴的老年人形象^[23]。这一研究结果说明,刻板印象极大地影响着海报设计者对老年人和老龄化过程的理解,同时也说明即便以悲悯情怀为依托的老年人形象塑造,也会受制于认知的片面性,从而有可能为偏见的蔓延和歧视的滋生提供条件。

传播媒介中的老化刻板印象极易产生这样的后果,即屈从于偏见与歧视的人们试图采纳社会优势群体的消极图景,并以与消极图景相一致的方式做出行为反应^[24]。

(二) 涉老学术研究中的消极特征取向

随着世界各国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涉老研究日益丰富,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关注老年人的负面特征以及基于这些负面特征的社会救济。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将研究重点放在与老龄相关的衰退和缺失上,将老龄化描绘为各种形式的生理与心理衰减,以及孤独与无助。如美国老年学家卡姆斯和亨利提出的脱离理论(disengagement theory),将老年期界定为个人社会角色、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退出,认为脱离是老龄化过程的最主要结果,具有普遍性和不可避免性^[25-26]。菲利普特将老龄化描述为:衰退和降级、生物学的控制、一种死亡预兆……是一群被他人照顾、被控制、被隔离、被研究的有问题的人群^[27]。

李逢战等通过对中国知网和 ISI Web of Knowledge 中1981—2010年间涉及老年心理学的中文和英文文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关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研究文献最多,占25.4%,内容包括心理状况、抑郁、焦虑、痴呆、孤独、精神疾病、睡眠障碍等。其次是社会生活(主要讨论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

生活质量、生活状况、养老、家庭和离退休等问题)、认知(包括认知干预、认知功能、认知损伤、记忆等多个方面)和生理变化(涉及老化、疾病和长寿等)方面的研究,分别占21.6%、18.9%、14.1%^[28]。从研究内容看,国内研究以关注老年人整体心理健康状况、精神状况为多,其次是关注老年人特定情绪健康,如抑郁、焦虑、孤独感等^[29]。彭华茂通过对近40年中国老年心理学研究的回顾,得出了类似的研究结论,即国内老年心理学主要聚焦于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30]。

认知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等方面。总体而言,涉老研究过于关注老年人认知能力的衰退,强调老年人的记忆障碍、观念固执、注意力难以集中等。事实上,影响一个人认知能力的因素不仅仅是年龄,还包括生活习惯、知识经验和价值观等方面。1963年,雷蒙德·卡特尔(Raymond Cattell)提出了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的概念,打破了传统上认为人的智力到了成年期就会停止发展并开始高速衰退的观念。流体智力是指思维的速度、熟练程度和短时记忆,晶体智力指一般的推理能力、语言能力和经验评估。前者以神经生理为基础,随神经生理的成熟而提高。后者则被认为是长期学习的结果,由社会文化、各类教育及个人经验所决定。流体智力在成年后逐渐减退,但晶体智力的发展贯穿于人的一生。知觉速度的减弱,机械记忆能力的下降,快速反应能力的衰退等,都可以由在教育和学习中增长起来的晶体智力来补偿。老年人只要不封闭自己,坚持参加适合自身特点的社会活动,依然能够保持较高的思维水平和认知能力。

在情绪研究方面也是一样,研究者更多地关注老年人的负面情绪,认为老年人由于生理的老化、社会交往的减少和社会角色地位的改变,更易产生诸如冷落感、孤独感、无用感等不满情绪。事实上,在漫长的生活中,老年人形成了相对稳固的价值观和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情绪和情感一般不会轻易因外界因素的影响而剧烈波动。

(三) 老年负面认知对积极老龄化的阻碍

老化刻板印象会对老年人的生理、认知、行为等产生重要影响,无论是社会负面认知还是老年人的自我负面认知都不利于积极老龄化的推进以及老年人个体的自我实现。

1. 社会负面认知渗透老年歧视

持消极老化刻板印象的人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呈现下降的趋势,容易健忘,行动迟缓,反应也更不灵活等。

无助无奈的老年人形象,被作为召唤社会善待年长之人的呐喊,被化为社会需要同情老年群体的疾呼。尽管出于善意,但有偏见之嫌;虽然基于哀怜,却带有歧视的色彩。景军、李敏敏(2017)认为,公益海报设计者将老年生活的悲惨境遇、对他者的依附、对社会支持的期待、病态的肢体、拄着拐杖的身躯、暗淡的色彩、失望的眼神等艺术表现手段,作为构建老年群体形象的刻板化象征符号,忽视了对老龄依附理念的警惕^[31]。

脱离主义及其研究倾向忽视了绝大多数老龄人口的潜在成长与发展,将老龄化视为一个消极的过程,造成在文化、制度和个体等层面渗透着老年歧视主义,加剧了老年群体的被边缘化与病态化现象^[32]。老年人的价值不仅表现在生产性劳动过程中,还表现在社会文化传承上,然而老年人的“弱势群体”地位往往导致其在参与社会的实践中遭受制度和保守观念的限制。

老年歧视源于一种不加反思的集体意识,反映着人们对老年人的社会价值、经济地位、健康状态以及精神面貌带有的刻板印象,其结果则是质疑积极老龄化的重要性与可行性。这几年,在学术界相当流行的“人口红利说”和“人口负债说”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这类观点认为,退休老人的增加一定会拉低人口抚养比,让年轻一代承受越来越大的养老负担,而忽视老年人过去为社会所做的贡献,也无视老年人依然可为社会做贡献的潜能。

由此可见,推进积极老龄化,应摒弃只将老年人视为被抚养对象的刻板定位,充分发挥老年人的

潜能与优势,特别是有效开发低龄老年人人力资本,从而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 自我负面认知有碍老年人的自我实现

老化刻板印象不仅是指社会对老年人形象概括而笼统的认知,也包括老年人自身对老年群体的基本看法。积极的自我认知有助于老年人的“自我完善”和实现人生价值,而消极的自我认知不但容易导致老年人认知能力的下降、负面情绪的加剧,还可能阻碍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感受和享受。

有研究发现,老年人对生活所持的乐观态度能预测其成功老化(successful ageing)。持积极老化态度的老年人可能更乐于参与生活、养成良好习惯、积极从事认知活动^[33]。贝林蒂尔和纽珀特研究发现,对老化持消极态度是导致老年人认知能力下降的危险因素^[34]。

莱维发现,持消极老化刻板印象的老年人,血压更高,对压力有更多的自动化反应,而持积极老化刻板印象则能降低老年人的血压^[35]。梅西亚等人以国别(法国,摩洛哥)、城乡(城市,农村)为自变量,考察了老年人的老化刻板印象与老化自我知觉的关系,结果表明,持有更多消极老化刻板印象的老年人,其老化自我知觉更差^[36]。

莱维、宗德曼、斯莱德和费鲁奇在其所进行的纵向研究中,使用个体成长模型分析了老化刻板印象对记忆的影响。采用非结构协方差矩阵控制年龄、抑郁、教育水平、婚姻状态、医院记录的慢性病数量、种族、健康自我评价、性别等协变量之后,研究发现那些持有更多消极老化刻板印象的被试,在38年的追踪测试中,其记忆成绩显著更差^[37]。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尊老、孝老、养老,形成了以血缘为伦理纽带、以孝道为文化支撑的生活方式,在传统文化习俗、道德规范的影响下,包括老年人在内的绝大多数,都认同老年时期是从社会中退出,回归家庭,享受和休养的阶段^[38]。大众媒介对老年人的表征,塑造了社会大众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同时也影响了老年人对自己的看法。比如,相当比例的老年人将自己视为家庭的负担,认为人一老就容易生病、脑子糊涂,就跟不上时代,认为高科技产品不属于老年人。在新媒体、新技术、新产品日新月异的当今,老年人所持有的这些负面刻板印象将严重阻碍老年人的社会融入和社会参与,制约其运用新技术满足精神生活需求的潜能。

三、解铃积极老龄化之路:满足老年人精神需求

2020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已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养老的核心问题应从解决贫困和物质匮乏转变为如何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积极老龄化强调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但这一社会参与不是迫于生计的被动参与,而是满足精神需求、实现自身价值的主动参与。

(一) 精神需求的内涵

西方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关注情感和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沃恩·本特森的研究指出,与好友、亲属和邻居的情感交流将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足感。马丁等人通过调查发现,社区中大部分老年人通过社会网络获得价值感、被尊重感和群体归属感等,而这些社会网络正是在社会参与中获得的,并不断通过社会参与得到强化^[39]。

近年来,老年人的精神需求逐渐受到国内研究者的关注。张晓曼等人通过对养老机构中生活自理老年人负性情绪的质性研究发现,养老机构中的老年人存在较多的负性情绪,需要增加情感和社会支持^[40]。许艺妍、吴宏洛以问卷的方式对福州市358位老年人进行调查,发现情感慰藉是城市老年人普遍而强烈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包括子女陪护,还包括社会认同、自我实现等需要^[41]。此外,政府的涉

老政策也开始日益关注老年人精神需求的满足,如国务院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指出,要更加注重老年人的精神关怀和心理慰藉。然而,我们研究发现,无论是涉老研究还是涉老政策,都存在着将精神需求狭隘化的倾向。如,认为精神需求就是文化需求,强调开办老年大学,满足老年人读书娱乐、琴棋书画等兴趣爱好;认为精神需求等同于精神赡养,强调子女“常回家看看”以缓解老年人的孤独寂寞。

精神需求并非只可意会、难以界定的抽象概念。一些研究者在相关研究中只是笼统地提及精神需求,而没有对它进行具体的界定^[42];还有一些研究者只是套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把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分为归属与爱、自尊、自我实现^[43],或是根据经验、常识将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归纳为亲情、社会交往、教育、文化娱乐、自我实现等方面^[44]。

我们认为,精神需求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类:一是基本型精神需求,也可称作被动型精神需求,其侧重点是社会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的精神生活保障,营造尊老、爱老的社会氛围。二是发展型精神需求,也可称作主动型精神需求,其侧重点是老年人通过积极主动的社会参与获得成就感、价值感、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精神需求的满足。

老年人精神需求的满足,不可能完全依赖他人而实现。社会对老年人的关爱和尊重并不必然转化为老年人的幸福感知,不恰当关心、照顾反而有可能强化老年人的“习得性无助”,^①降低老年人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美籍德裔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son E.)提出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认为,老年阶段面临着“自我调整与绝望”这一心理矛盾,如果老年人能发挥余热,受到尊敬,就会感到生活充实而有意义,否则便会产生“无用感”“累赘感”。心理学家班杜拉(Bandura A.)所提出的自我效能理论启示我们,如果老年人在享受退休生活的同时,能为社会贡献自己的智力资源,定会产生“我能,我行”的自我效能感。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老年人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潜能必将得到进一步释放,开发利用老年人的知识技能资源并使之适应时代发展的步伐,从而有效促进老年人经济社会角色和老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这是新时代积极老龄化的必然选择。

尊老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然而尊老并不是把老人“圈”起来、“供”起来。很多人以为,只要让老人吃好喝好,满足其物质需求、确保其人生安全,就是最大的孝敬。却不曾想,这种“废物式”养老不仅会加速衰老,而且也是对尊老的背离。

(二) 积极老龄化的现实路径:助力乡村振兴

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对自我能动性选择有了更高的要求,对实现自我价值也有更大需求^[45]。杜鹏在对中国老人养老方式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提出“重新认识老年人的社会价值、促进老年人参与社会建设并实现其全面发展是走中国特色养老之路的应有之义”^[46]。对老年人特别是城市老人来说,发挥自身优势,助力乡村振兴,是时代赋予的满足其精神需求的理想选择,也是推进积极老龄化的现实路径。

1. 乡村振兴对人才的期盼

自20世纪90年代始,我国中西部地区就已经出现因大批青壮年外出务工而导致的空心村现象。由于乡村产业单一,科技含量不高,大量青壮年特别是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壮年进城打工、定居,空心村问题在经济发达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产业不旺加剧了农村人才的流失,而人才流失又使得乡村产业发展失去支撑。

我国农业从业人员年龄偏大、学历偏低。以浙江省为例,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6年全

^①1967年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在研究动物时首次提出这一概念,意指因为重复的失败或惩罚而造成的听任摆布的行为,后衍生为通过学习形成的一种对现实的无望和无可奈何的行为、心理状态。

省农业生产经营人员527.8万人,其中35岁及以下的25.2万人,占比4.77%,年龄55岁及以上的284.9万人,占比54%。从学历看,全省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比56.1%,初中文化程度的占比为36.1%,高中文化程度的为6.6%,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仅占1.2%。

为改变乡村建设人才短缺问题,我国自1995年起试行大学生村官制度,截至2016年底,全国在岗大学生村官人数超过10万人,累计人数达到47万余人,然而政策性激励下的大学生村官任期较短,流动性较高,能否在任期内及时发挥自身的带动作用仍然存疑。

乡村振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乡村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各类人才支撑,而人才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并不是靠单一的项目引进、税收减免、下乡补助、干部结对等措施所能解决。一些地方出台“大学生招引计划”“贤人回乡计划”等,积极引导大学生、当地乡贤、专业人才返乡下乡就业创业。同时,创办农民培训基地,围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特色产业、文化传承、农村电商等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开设特色人才培养项目,培养在地人才。然而,这些措施大多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试点经验也难以复制推广。陈晓莉、吴海燕认为,实现乡村振兴,需要通过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带动和促进农村发展^[47]。

2. 城市老人的文化与技能优势

城市退休老人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老年人”正是乡村振兴的人才聚宝盆,他们大多受过中等以上学校教育,具有一定的专业特长。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我国城市人口3.8亿人,50岁以上人口数量9298万人,50-64岁人口数量6197万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超过1320万人,这些老年人现年60-74岁之间,处于退休年龄且身体比较健康,可以力所能及地发挥所长。城市老人的受教育程度远远超过农村老人。60-64岁、65-69岁、70-74岁、75-79岁四个年龄组,城市老年人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分别占所在年龄段城市老年人总数的37.3%、40.7%、51%、61.5%,而农村老年人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分别占所在年龄段农村老年人总数的77%、80.9%、88.5%、92.9%。四个年龄组大专以上学历受教育程度的城市老人分别占所在年龄段城市老年人总数的10%、11%、12%、8.6%,而农村老年人占所在年龄段农村老年人总数的比例均未超过0.36%。^①

城市退休老人中专业技术人才比例高,退休前很多人从事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管理、工程技术等方面的工作,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人老年人在文化程度、专业技能、工作经验、思维视野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推进,以及老年人健康水平、文化程度、保障状况的提高,为老年人继续参与经济社会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推进积极老龄化奠定了基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未来老年人作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将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认可。

3. 品质养老的现实选择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相继提出逐步实现由“基本养老”向“品质养老”转变的老龄化目标,然而对于什么是品质养老,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都没有明确的界定。我们认为,品质养老就是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特别是高层次精神需求,而满足精神需求的途径就是社会参与,这正是积极老龄化所倡导的核心理念。

2006年,我国老龄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建设“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然而,现实状况是:随着家庭结构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迁,家庭养老的服务

^①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尚未全文公布。根据初步判断,城市老年人口的文化与技能优势将大幅度超越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功能日趋弱化,社区养老则由于自主性弱等原因,目前还未发挥重要作用。公办养老机构数量少,能够容纳的老年人有限。民办养老机构除了极少数以高收入老年人口为目标群体的高档养老院外,大多在盈利与公益之间徘徊。更何况,现有各类养老模式大多停留于生活照料,难以满足老年人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与格根夫妇提出的积极老龄化的三大核心主题相距甚远。即便在月均花费万元以上的高档养老机构,老年人也面临着群体归属感、社会认同感以及价值感难以实现的状况。

一方面乡村振兴亟需人才,另一方面城市退休老人有意田园生活,其中不乏乡村振兴用得上的各类人才。因此,将城市养老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利用美丽乡村的闲置住房,助力城市养老,同时发挥城市老人的智力优势,添翼乡村振兴,实现城市养老与乡村振兴的互补共赢,不但可以低成本缓解养老供需矛盾,使政府腾出更多资源解决失能老人的养老问题,而且可为乡村振兴提供各类人才支持,解决乡村振兴的瓶颈制约。城市老人结伴到乡村养老,亲朋好友互相照应,不但有利于满足社交、亲情等基本型精神需求,还可以免除子女后顾之忧。更重要的是,这一养老模式有助于发挥老人专业技能,使老年人通过积极主动的社会参与获得成就感、价值感、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精神需求的满足,从而实现品质养老的目标。

积极老龄化是老龄化社会的本来含义,而不是因为老龄化压力大而采取的被动措施。“积极”是指所有老年人,包括残疾、患病、无业、退休的老年人,都能够通过参与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精神文化活动来为社会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当前,积极老龄化已成为全球面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关键政策制度和重要的战略计划^[48]。然而,反思当前各种养老理念、养老模式、养老政策,可以认为,大多未立足于发掘老年人的潜力和优势,与积极老龄化的本义相距甚远。面对精神需求更加强烈的新一代老人,要解决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必须转变思路,摒弃一直以来把所有老年人都当作弱势群体的误区,构建吻合积极老龄化本质特征的政策支持体系,完善老年人服务社会的机制和平台,为老年人发挥余热、实现自我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 [1]王辉,杨卿棚. 新中国70年人口变迁与老龄化挑战:文献与政策研究综述[J]. 宏观质量研究,2019(2):30-54.
- [2]胡湛,彭希哲. 对人口老龄化的再认识及政策思考[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5):65.
- [3]闫海春.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 长春:吉林大学商学院,2019.
- [4]RICARDO P C, SVETLANA V D, LAURAANGELICA B M, et al. A Social Health Services Model to Promote Active Ageing in Mexico: Design and Evaluation of a Pilot Program[J]. Ageing and Society, 2015(7):1457-1480.
- [5]GERGEN K J, GERGEN M. Positive Aging: New Images for a New Age[J]. Ageing International, 2001, 27(1):5.
- [6]GASIOREK J, FOWLER C, GILES H. What Does Successful Aging Sound Like? Profiling Communication about Aging[J].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5, 41(4):577-602.
- [7]BASSUK S S, GLASS T A, BERKMAN L F. Social Disengagement and Incident Cognitive Decline in Community-dwelling Elderly Persons[J].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1999, 131(3):165-173.
- [8]WANG H, KARP A, WINBLAD B, et al. Late-life Engagement in Social and Leisure Activities is Associated with a Decreased Risk of Dementia: A Longitudinal Study from the Kungsholmen Project[J].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002, 155(12):1081-1087.
- [9]张文宏,张君安. 社会资本对老年心理健康的影响[J]. 河北学刊,2020(1):183-189.
- [10]PUTNAM R.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182.
- [11]WALKER A. Population Ageing from a Glob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European Lessons on Active Ageing. Age-Friendly Cities and Communitie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M]. Berlin: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6:92.
- [12]胡宏伟,李延宇,张楚,等. 社会活动参与、健康促进与失能预防——基于积极老龄化框架的实证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2017(4):87-96.

- [13] 朱伟珏. 社会资本与老龄健康——基于上海市社区综合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社会科学, 2015(5):69-80.
- [14] ROH H W, CHANG H H, LEE Y, et al. Participation in Physical, Social, and Religious Activity and Risk of Depression in the Elderly: A Community-Based Three-Year Longitudinal Study in Korea[J]. PLOS ONE, 2015, 10(7):1-13.
- [15] UEBELACKER L A, EATON C B, WEISBERG R, et al. Social Support and Physical Activity as Moderators of Life Stress in Predicting Baseline Depression and Change in Depression over Time in the Women's Health Initiative[J]. Social Psychiatry &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2013, 48(12):1971-1982.
- [16] 李伟, 寒梅. 基于“积极老龄化”理念下的城市适老空间设计探究[J]. 建筑学报, 2014(11):84-89.
- [17] LEVY B, ASHMAN O, DROR I. To be or not to be: The Effects of Aging Stereotypes on the Will to Live[J].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2000, 40(3):409-420.
- [18] LEVY B R. Mind Matters: Cognitive and Physical Effects of Aging Self-Stereotypes[J].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3, 58(4):203-211.
- [19] BENNETT T, GAINES J. Believing What You Hear: The Impact of Aging Stereotypes upon the Old[J].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2010, 36(5):435-445.
- [20] RUBINSTEIN R L. Social Isolation and Social Support: An Applied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 1994, 13(1):58-72.
- [21] PALMORE E. Ageism: Negative and Positive[M]. New York: Springer, 1999:201-205.
- [22] 陈曦. 刻板印象理论视野下老年群体“妖魔化”报道成因探析[J]. 新闻论坛, 2018(4):84-86.
- [23] 景军, 李敏敏. 刻板印象与老年歧视: 一项有关公益海报设计的研究[J]. 思想战线, 2017(3):71-77.
- [24] 郭爱妹, 石盈. “积极老龄化”: 一种社会建构论观点[J]. 江海学刊, 2006(5):124-128.
- [25] CUMMINGS E, HENRY W. Growing Old: the Process of Disengagement[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1:293.
- [26] FOSTER L, WALKER A. Active and Successful Aging: A European Policy Perspective[J]. The Gerontologist, 2015, 55(1):83-90.
- [27] PHILIBERT M. Philosophical approach to gerontology. In Hendricks J & Hendricks D(Eds.). Dimension of Ageing[M]. Cambridge, MA: Winthrop, 1979:379-394.
- [28] 李逢战, 王大华, 李晓彤, 等. 中国老年心理学研究文献计量学[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4(7):3912-3914.
- [29] 王贵生, 李逢战, 申继亮, 等. 中国老年人心理健康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3(17):4223-4225.
- [30] 彭华茂. 21世纪中国老年心理学研究: 现状与未来[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7(4):496-503.
- [31] 景军, 李敏敏. 刻板印象与老年歧视: 一项有关公益海报设计的研究[J]. 思想战线, 2017(3):71-77.
- [32] 郭爱妹, 石盈. “积极老龄化”: 一种社会建构论观点[J]. 江海学刊, 2006(5):124-128.
- [33] CHEUNG K S, LAU B H. Successful Aging among Chinese Near-centenarians and Centenarians in Hong Kong: A Multidimens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Aging & Mental Health[J]. 2015, 20(12):1314-1326.
- [34] BELLINGTIER J A, NEUPERT S D. Negative Aging Attitudes Predict Greater Reactivity to Daily Stressors in Older Adults[J].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8, 73(7):1155-1159.
- [35] LEVY B. Handwriting as a Reflection of Aging Self-stereotypes[J].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2000, 33(1):81-94.
- [36] MACIA E, LAHMAM A, BAALI A, et al. Perception of Age Stereotypes and Self-perception of Aging: A Comparison of French and Moroccan Populations[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2009, 24(4):391-410.
- [37] LEVY B R, ZONDERMAN A B, SLADE M D, et al. Memory Shaped by Age Stereotypes over Time[J].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2012, 67(4):432-436.
- [38] 吴海涛, 王晶. 从传统到现代——积极老龄化视域下养老文化的思考[J].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4):213-217.
- [39] HOBAN M, JAMES V, BERESFORD P, et al. Shaping Our Age-involving Older Age: The Route to Twenty-first Century Well-being[M]. Final Report. Cardiff: Royal Voluntary Service, 2013:34.
- [40] 张晓曼, 鱼莉军, 顾静, 等. 养老机构生活自理老年人负性情绪的质性研究[J]. 护理学杂志, 2018(21):76-78.
- [41] 许艺妍, 吴宏洛. 城市居民的养老意愿与老年人精神需求探析——以福州市为例[J]. 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13(2):1-7.

- [42]黄艳钦,郝佳,曹丹妮.老年人精神需求调查及对策分析[J].统计与管理,2020(1):80-83.
- [43]行红芳.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系统与需求满足[J].中州学刊,2006(3):128-131.
- [44]李芳.老年人精神需求及其社会支持网的构建[J].学术交流,2012(8):116-119.
- [45]夏辛萍.积极老龄化视野下敬老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及老年人参与志愿者活动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老年学,2016(23):6022-6024.
- [46]杜鹏.回顾与展望:中国老人养老方式研究[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6:85.
- [47]陈晓莉,吴海燕.创新城乡融合机制:乡村振兴的理念与路径[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12):54-60.
- [48]FOSTER L, WALKER A. Active and Successful Aging: A European Policy Perspective [J]. The Gerontologist, 2015, 55(1):83-90.

How Far is Active Aging from Us ——a reflection and exploration based on the spiritual needs of the elderly

FANG Jianyi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Zhejiang,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core problem of providing for the aged in China has changed from solving poverty and material shortage to how to meet the spiritual needs of the elderly. The essence and core of active aging is social participation. Active social participation helps the elderly gain respect and dignity, and feel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life. However, the negative stereotype of aging and the negative characteristic orientation of aging related research hinder the promotion of positive aging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spiritual needs of the elder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reflection of aging dilemma, aging stereotype 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piritual needs of the elder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win-win” strategy of urban pens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explores the realistic path to meet the spiritual needs of the elderly.

Key words: active aging; spiritual needs; social particip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责任编辑 彭何芬)